

# 琼·罗宾逊与 两个剑桥之争

[美]玛乔里·谢泼德·特纳 著  
胡希宁 范重庆 译 范重庆 胡希宁 校

# 琼·罗宾逊与 两个剑桥之争

[美]玛乔里·谢泼德·特纳 著

胡希宁 范重庆 译

范重庆 胡希宁 校

江西人民出版社

**(赣)新登字第001号**

**书 名:** 琼·罗宾逊与两个剑桥之争  
**作 者:** [美] 玛乔里·谢泼德·特纳  
**翻 译:** 胡希宁、范重庆  
**出 版 行:** 江西人民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经 销:** 江西省新华书店  
**印 刷:** 九江印刷总厂  
**开 本:** 850×1168mm 1/32  
**印 张:** 13.625  
**字 数:** 350千  
**版 次:** 1991年12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定 价:** 8.60元

ISBN7—210—01105—6/F·98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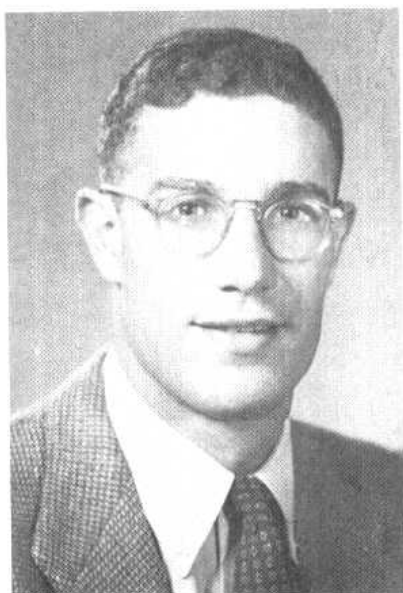
**邮政编码: 330002 电报挂号: 3652 电话: 3320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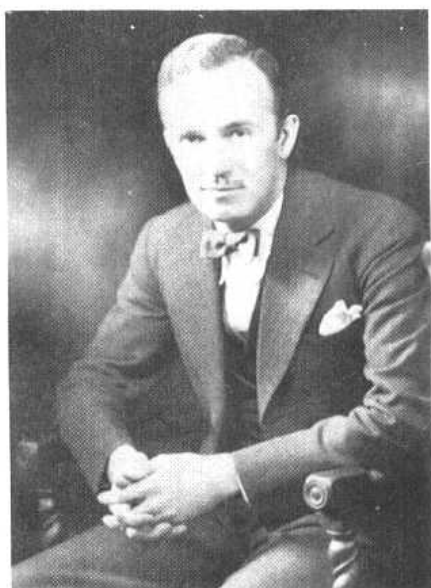
琼·罗宾逊(19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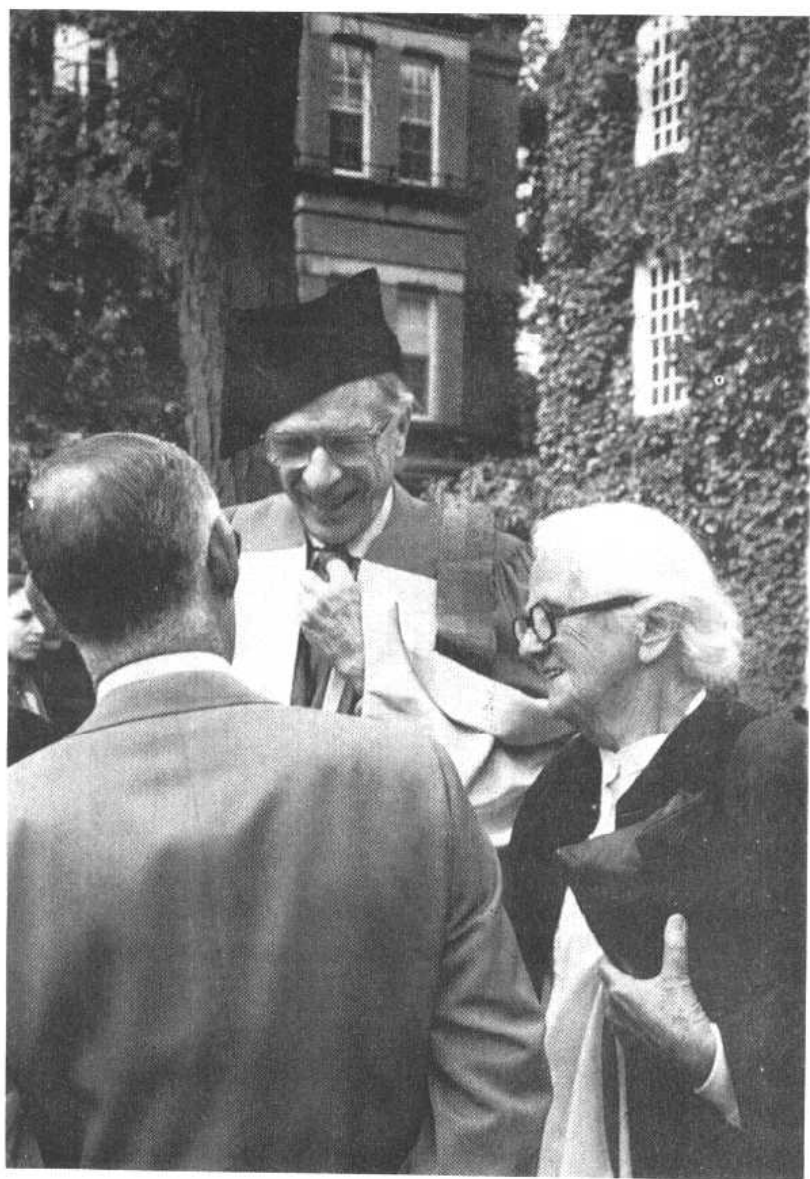
左上, 保罗·安东尼·萨缪尔逊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第一年(1940)



右上, 罗伯·默顿·索洛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第一年(1950)



右, 刚从哈佛大学完成博士论文的爱德华·赫斯廷斯·张伯伦(1928)



罗宾逊和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在一起(1980. 6)



左, 罗宾逊参加哈佛大学的  
毕业庆典(1980. 6)

下, 罗宾逊和加尔布雷思  
在一起休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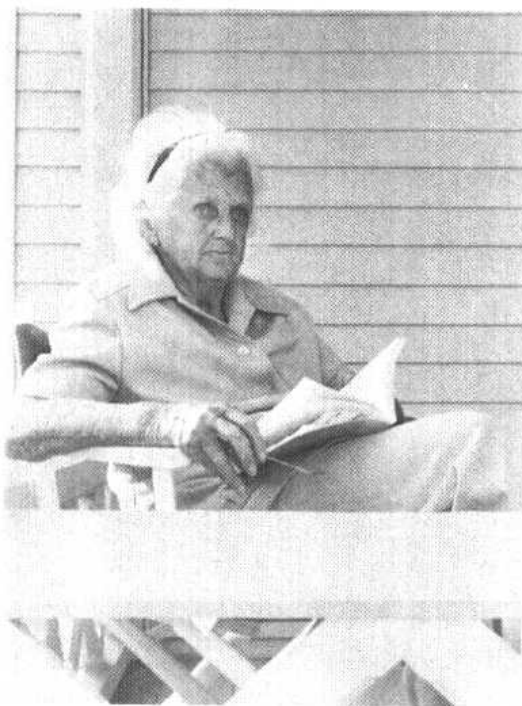


上,罗宾逊和J·D·贝尔纳一道在剑桥大学的校园里出席贝尔纳儿子的结婚招待会(196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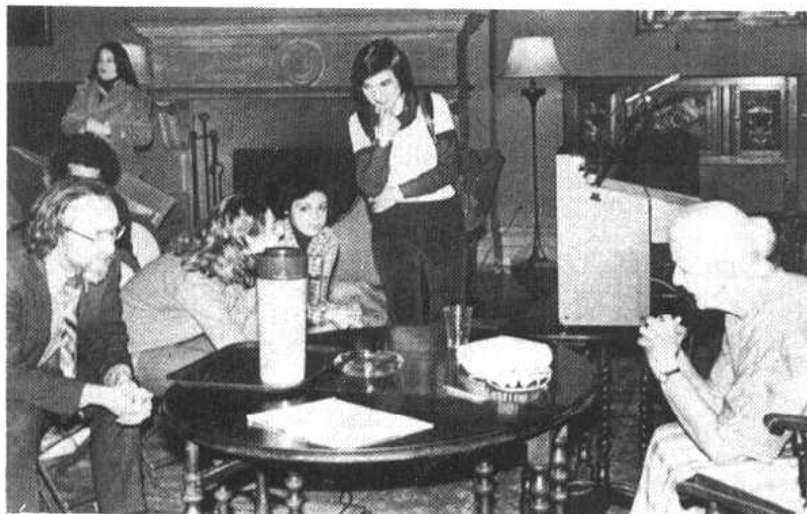
右,罗宾逊在哈佛大学(198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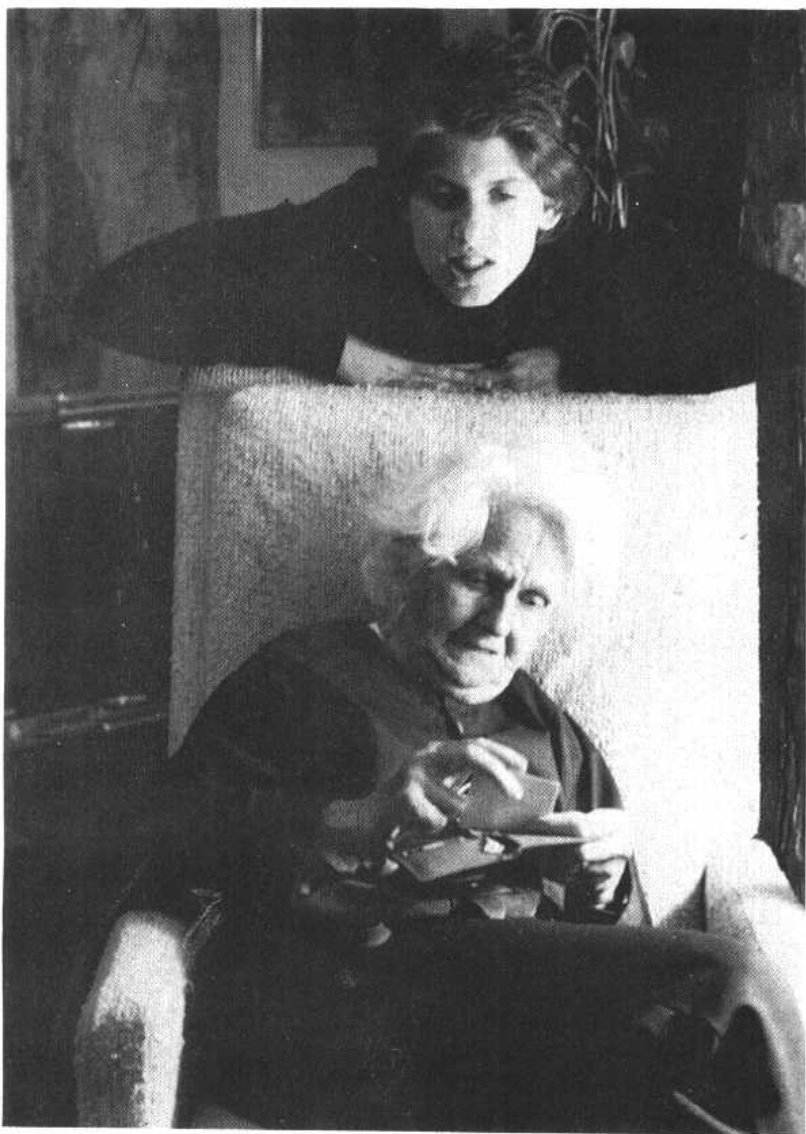




左,罗宾逊在  
威廉姆斯大学  
(1982. 秋)

下,罗宾逊在巴纳德  
大学和爱德华·内尔  
及学生们交谈(1976)





罗宾逊和朱丽叶·斯科尔(威廉姆斯大学, 1982)



琼·罗宾逊(1965)

## 中译本序言

在1989~1990年访问美国期间，我带着很大的兴趣阅读了玛乔里·谢泼德·特纳的新著 *Joan Robinson and the Americans* (M. E. 夏普出版公司1989年版)。回国后，我请胡希宁同志组译此书，供我国读者参考。经过胡希宁、范重庆等同志的通力合作，这本书的中译本现在已经和我国读者见面。书名改为《琼·罗宾逊与两个剑桥之争》。

琼·罗宾逊是我国读者所熟悉的英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她的研究范围很广，著作很多。仅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译本就有《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就业理论引论》、《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资本积累论》、《经济学论文集》、《现代经济学导论》（与伊特韦尔合著）以及她编的论文集《凯恩斯以后》等。

琼·罗宾逊于1903年出生于英格兰坎伯利的一个军官家庭。她结婚前的名字是琼·维奥列特·莫里斯。1922~1925年，她在剑桥大学攻读经济学。1926年，她和经济学家奥斯汀·罗宾逊结婚，并一起去印度。1929年回国。在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后，罗宾逊夫人开始在剑桥任教。1965~1971年，罗宾逊夫人任剑桥大学经济系教授。此后任剑桥大学经济系名誉教授。1983年逝世。享年80岁。

特纳的这本书是一部研究罗宾逊夫人的专著。这本书展示了广阔的视角，系统地考察了罗宾逊的生平，特别是她的学术活动，研究了她的理论贡献，重点论述了她与美国经济学家的关系。罗宾逊和美国经济学家的关系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

作为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创立者的罗宾逊和作为垄断竞争理论创立者的张伯伦的关系；作为英国剑桥凯恩斯学派领袖的罗宾逊和作为美国剑桥凯恩斯学派代表人物萨缪尔森、索洛的关系；作为英国后凯恩斯主义者的罗宾逊和美国后凯恩斯主义者戴维森、艾克纳的关系；以及罗宾逊和美国新制度学派领袖加尔布雷思的关系等等。

特纳在撰写这本书时，查看了有关罗宾逊的各种档案资料，采访了英、美许多经济学家，借阅了和罗宾逊通信的复印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因此，本书内容翔实，叙述生动。作者对罗宾逊许多主要论著的写作背景、撰写过程、基本思想、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贡献、学术界的评论和社会反响等，都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分析和评论。

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罗宾逊是西方经济学家中相当少见的一位批判家。她心目中没有偶像，敢于对西方正统经济理论进行严厉的批评。她不愿意批判小人物，而常常紧紧抓住头面人物不放。“她集中与索洛和萨缪尔森论战的原因是她认定他们是在美国讲授主流经济学的头面人物。”（本书第147页）罗宾逊甚至对马歇尔和凯恩斯也不客气。据她回忆：“当我在1922年到剑桥开始攻读经济学时，马歇尔的《原理》是圣经，除此之外我们几乎什么也不知道。”（本书第14页）罗宾逊相信过这部“圣经”，但是后来她指出，马歇尔充当了“食利者的战士”，把利润等同于利息，把利息说成是“等待的报酬”。“她反对马歇尔用‘等待’作为一种对所有权索取报酬的辩护，她说那只不过是使索取合理化而已。”（本书第151页）说到美国克拉克的著作，罗宾逊指出，那是“新古典学派庸俗化的美国翻版”。（本书第152页）罗宾逊对正统理论的批判尽管是在西方经济学家的视野内进行的，然而确有相当深刻

之处。本书作者说：“本世纪很少有经济学家象罗宾逊那样独自一个人向那么多人发起进攻”（本书第159页），“惹得一些世界上有名望的经济学家气得发抖”（本书第1页）。

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史上，罗宾逊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有资格和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平起平坐。我们知道，这两本书都是1933年出版的，后者只比前者早几个月。张伯伦声称自己享有优先权，罗宾逊夫人则断然否认她所使用的概念同“随意剽窃”之间有任何关系。本书作者在周密细致地调查研究之后，了结了此案，确认这两部著作是“不好辨认的双胞胎”，纯属巧合，这种巧合是经济思想史上的六个重合发现之一。

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罗宾逊夫人在两个剑桥之争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她经常主动出击，使萨缪尔森等人处于守势。罗宾逊在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之前就已经是凯恩斯主义者，自认为是凯恩斯主义的正宗。有时她自称是“凯恩斯主义左翼分子”（本书第115页）。萨缪尔森则自认为他的新古典综合是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罗宾逊在英国剑桥，萨缪尔森在美国剑桥（即麻省理工学院所在地坎布里奇），他们的论战因而被称为两个剑桥之争。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从罗宾逊夫人发表《生产函数与资本理论》一文的1953年算起，到她逝世的1983年为止，论战经历了30年之久。争论的问题很复杂，涉及的范围很广。本书作者用很多篇幅详细地讨论了这场论战，叙述了论战的起因、经过和结果。我们在本书中看到，罗宾逊夫人多次指责萨缪尔森和索洛等人，指出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是“冒牌的凯恩斯主义”，人为地复活了被凯恩斯革命清算过的陈腐教条“萨伊定律”。罗宾逊说，萨缪尔森等人的冒牌的凯恩斯主义“凭借着全能美元的翅膀传播到世界各地”，

甚至影响了本应能了解萨缪尔森真相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本书第158页）。罗宾逊夫人不仅在自己的论著中揭露和批判萨缪尔森的许多观点，而且当面责难，弄得萨缪尔森很难堪，使萨缪尔森“作出了某种公开的认错”（本书第248页）。罗宾逊说：“新古典理论已是一团糟，正如萨缪尔森现在已私下承认的那样。”（本书第271页）不过，本书作者认为，总的说来，两个剑桥在论战中打了一个平手，没有一方获胜。有的西方评论家认为：罗宾逊对美国剑桥经济学家的资本理论和生产理论的批判可能是正确的。但是，破坏容易重建难。意思是：罗宾逊没有创立一套可以替代的理论。罗宾逊本人看来也完全意识到这一点，她和伊特韦尔的《现代经济学导论》就是为此目的而写的。“她希望这本书会在美国广泛地采用，以便与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相抗衡。”（本书第225页）

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罗宾逊夫人在美国经济学家中也有交情很好的朋友，加尔布雷思就是其中友谊最深的一个。他们从30年代在英国剑桥相识到1983年罗宾逊夫人去世一直保持着十分友好的关系。共同的思想观点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罗宾逊着力批判冒牌的凯恩斯主义，加尔布雷思也把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作为进攻的靶子。罗宾逊和加尔布雷思在反对军备竞赛方面都进行了大量的政治活动，这也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值得一提的是，罗宾逊并不因私人友谊而袒护加尔布雷思的某些理论错误。她反对加尔布雷思的抗衡力量论，认为这是对美国资本主义的另一种辩护。

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罗宾逊夫人是一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比较有研究的西方经济学家。在3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剑桥大学的学生中是“尽人皆知”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可供选择的经济学之一”（本书第85页）。从1940年起，罗宾

逊开始读《资本论》，“想看看里面有些什么”。罗宾逊说：

“结果我发现了许多东西，它的追随者与反对者都未曾料到我会发现它们。”（本书第91页）罗宾逊发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正统派经济学之间的本质区别有两点：第一，正统派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永恒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而马克思则认为它是从封建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第二，正统派经济学家认为社会各部分的利益是调和的，而马克思则认为不劳动的财产所有者和没有财产的劳动者之间的利益是冲突的。罗宾逊主张西方经济学家“向马克思学习”。她批评西方学者说：“传统的理论学派由于拒绝向马克思学习而显得极为愚蠢”（本书第116页）。罗宾逊指责西方经济学忽视了马克思的理论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其中包括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她认为，经过很长时间，卡莱茨基的动态经济理论和哈罗德、多马的经济增长理论才重新发现了经济发展理论的基础。如果早点认真重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话，本来是可以节省大量时间的。但是，罗宾逊把劳动价值论说成是“简单的教条主义”，硬说劳动价值论不能提供一种价格理论。她还力图寻找马克思和马歇尔、李嘉图、凯恩斯之间的“相同点”。有人把罗宾逊夫人称为“马克思化的凯恩斯主义者”。本书作者不同意这一说法，而是认为罗宾逊实实在在是一名带有斯拉法观点的卡莱茨基——凯恩斯主义者”（本书第306页），“实际上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本书第132页）。这一评价是符合实际的，也符合罗宾逊夫人自己的看法。她自己承认：

“我本人也是资产阶级的一员，我写它的目的只是为了告诫我那些资产阶级同仁们，在《资本论》中存在深刻而重要的思想，对于这些思想他们不应该继续忽视下去。”（本书第127



页)

在本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罗宾逊夫人是一位对我国态度友好的经济学家。从1953年到1978年，她先后六次访问中国，交了许多朋友。她公开称赞中国的社会革命(本书第308页)，赞成共产主义者在中国的社会实验(本书第1页)。她发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里取得了良好的声誉”，“马列主义还向中国揭示她能够变成一个伟大的工业化国家”。罗宾逊的结论是：“在我看来，中国似乎最终证明，共产主义并非资本主义之外的一个阶段，而是资本主义的替代物。”(本书第122页)

关心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会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罗宾逊夫人没有获得诺贝尔奖。本书作者对此进行了专门研究，并提供了答案。作者系统地、全面地研究了历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情况，发现该奖获得者中没有女性，没有西方的左翼人士。作者说：“我所访问的一些经济学家在评论罗宾逊没能获得诺贝尔奖时，他们集中认为：要么是由于琼·罗宾逊的性别，要么是她的政治倾向。”(本书第320页)作者还告诉我们，有人认为，罗宾逊夫人的《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表“影响到她获取诺贝尔奖资格”(本书第108页)。罗宾逊夫人对此似乎坦然自若，她说：“我宁愿感到自己受到了一种不公平的待遇”。(本书第323页)。

总之，我们从特纳的这本书中可以透视到西方经济学的内幕，看到许多在西方经济学论文、专著和教科书中看不到的东西。这对我们研究和思考西方经济学是有益的。因此，本书值得一读。

吴易风